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文化论

饶 德 江

历史是昨日的新闻,是人的社会实践的记载。描写真人实事的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我国渊源于史籍的传记文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略具雏形,到司马迁笔下达成熟,放出异彩,后代史籍中不乏优秀传记,而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创作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传记名篇。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歌是以抒情诗为主流而缺乏荷马史诗般的巨著,那么,源远流长的传记文学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取得了堪与西方名著比美的辉煌成就。现实是历史与未来的中转站。探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价值,对现实对未来都不无启迪作用。限于学识与篇幅,本文仅在求真精神、道德原则、情感导向等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

文学贵“真”。传记文学尤其贵在求真。虚假浮夸、华而不实的作品只能让人望而生厌,根本无价值可言。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当我们在看书时,每碰到一个不正确的细节,真实感就向我们叫着:‘这是不能相信的!’如果这种感觉叫得次数太多,那么这本书现在与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价值了。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①当然,文学之“真”与现实生活既相通又有差异,不少名著是通过想象虚构而体现真实。如果说求真是对一切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那么,以真人实事为描写对象的传记文学,真实性就更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

我国早期文史合流,有文史不分家之说,最早的史籍在记事记人中即显示出文学色彩,滋育着传记文学的萌芽。传记文学的求真精神发源于先秦史家。他们为记载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甘愿冒种种危险,即使要为此失去生命,他们也不愿放弃求真精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杀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又《左传·宣公二年》记董狐坚持书赵盾弑君事,并录孔子语:“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对于南史氏、董狐那样的良史,追求真实和记录真实是如此重要,乃至于可以为此而毫无犹疑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使传记文学略具雏形的《左传》作者也继承了这种良史作风,在写人记事时追求真实,“书法不隐”。例如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宰夫胾熊蹯不熟,杀之,真诸肴,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对于统治者残暴荒淫的罪行,《左传》中有不少真实记录。

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不但继承了先贤的求真精神，而且发扬光大，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我们知道，主要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不少文士和平民；写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写了刺客、游侠、倡优和占卜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物都凸现于司马迁笔下，求真精神象红线般贯穿于《史记》中的各色人物。书法不隐的求真精神突出体现在司马迁对封建帝王的真实描写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是至高无上、神圣无比，不容丝毫冒犯，但司马迁对于历代帝王，即便是当朝的开国之君刘邦和当朝皇帝刘彻，也决非一味的歌功颂德，而是求真求实，既写他们的功绩，也写他们的缺点，以至暴露他们的黑暗和残暴，凛然表现出一位良史公正不阿的求真精神。尽管司马迁的作法遭到后代持封建正统观念者的反对，但他忠于历史事实，敢于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却仍然被史家承认。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里对司马迁颇有非议，但他也说《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勇于“实录”的求真精神成为后代良史的宝贵传统，也扩展到文学领域，尤其成了传记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王充以“疾虚妄”、“求实诚”作为《论衡》一书的中心思想，大力提倡“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为古代文论中的求真传统奠定了基础。以后，曹丕强调“铭诔尚实”^②；刘勰把“事信而不诞”作为评论文学的首要原则^③；刘知几大力倡导“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作风，要求史传文真正成为客观历史的实录^④；韩愈强调“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声明自己创作传记文学的基本态度^⑤；顾炎武说：“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⑥。着重指出作为传记之一的志状的史料真实性。总之，认为西方传统文学重摹仿重再现所以重求真，中国古代文学重抒情重表现而忽略求真，这种流行观念未免简单化和有片面性，是值得慎重商讨的。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历来都重视和强调真实性，贯穿着“书法不隐”，“求实诚”的求真精神。

传记文学源于史籍的求真精神，与中华民族在特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密切相关。马克思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希腊罗马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时指出，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奴隶制和农奴制都是由原始的部落体发展而来的，“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⑦。这一看法，对理解我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学艺术具有重大意义，对理解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也具有关键意义。我国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对原始部落体的形式，亦即原始氏族公社的形式“改变的最少”。也就是说，原始氏族公社的制度、习俗、风尚大量地被保存了下来。尽管伴随着文明社会的来临和发展，“习惯性的虚伪”（恩格斯语）越来越成为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第二天性，但原始氏族公社那种人的真淳质朴、坦诚无欺以及在严酷生存条件下无畏地面对现实的古代英雄主义精神仍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积淀。传记文学的求真精神是与我们民族真淳诚朴的文化特征密不可分，是与古代英雄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的。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求真精神总是与历代统治者的虚妄伪假针锋相对，一直存在着斗争的。在封建社会早期，处于上升、发展地位的统治阶级还相信自己的力量，还能够面对现实和力求发展，因此也还能在相当程度上容忍求真精神的存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中体现的求真精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大量优秀传记文学所体现的求真精神，足以证实上述情况。随着封建社会的走向衰亡，封建专制和封建集权高度强化，封建统治者日趋封闭、僵化、腐朽，只能靠虚假伪善和残酷镇压来维系其统治地位。因此，自宋代以后的所谓“正史”中，其内容大多是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虚美隐恶的东西，

很少见到洋溢着求真精神的传记文学作品。而明清以来屡屡兴起的“文字狱”和正直文士的悲惨遭遇,更说明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是何等害怕事实与真理,采用了何等的血腥手段来扼杀文人中的求真精神。尽管如此,我国传记文学的求真传统并未中断,仍在不少文学家创作的传记作品中放射出光芒。读明清时期袁枚的《徐文长传》、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汪琬的《江天一传》、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等传记名篇,我们不难体会到古代传记文学的求真精神所显示的顽强生命力。

文学的求真精神,是人的审美本质的艺术体现。文学的真实,不仅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或摹仿的逼真,也不限于情感真实或想象真实,而是生命的真实——人的本质力量的总体投注,人的知、情、意的全面介入,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完全融合,才能使文学创作主体的体验之真贯穿于作品之真而使欣赏者达到再度体验之真。正由于此,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求真精神才更显珍贵和给人启迪。

二

真、善、美的统一是对任何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说求真精神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生命线,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善则是其灵魂。在我国古代,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伦理道德在意识形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历史著述的写作目的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刘勰说:“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癉恶,树之风事”^⑧,写史书是为了表彰善和贬斥恶,树立符合道德原则的社会新风气,孔子作《春秋》便是“举得失以表黜陟,微存亡以标劝戒”,因而“乱臣贼子惧”^⑨;司马迁在《自序》里反复论述《春秋》的要义与功用,最后结论似地说道:“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不仅把《春秋》视为伦理道德的大宗,而且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写作准则的。古代传记文学的求真精神总是和“美刺”的观念相伴并行,“实录”的基本内涵是“不虚美、不隐恶”,写真乃是为了褒善贬恶,归根结底是为道德服务。

道德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包含着民族性的、历史的、具体的丰富内涵。在我国古代,由于原始氏族制度、习俗、风尚的大量存留,社会虽然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阶级和等级的种种划分,但这种划分仍然和氏族血缘的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便是政治上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基于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的,如把“官”称为“民之父母”。因此,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伦理道德在意识形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源于古代氏族公社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儒家以“仁”亦即“爱人”为道德的最高原则,道家认为“爱人利物之谓仁”^⑩,在尖锐批判社会黑暗的同时流露出对氏族社会道德状况的赞美。极大地规范、制约和影响我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儒道两家,都有着强烈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恩格斯指出,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又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道德成了阶级的道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和原始民主意识正是对统治阶级道德的有力抗争,并在我国大量优秀传记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司马迁的道德观念里,原始人道精神和民主意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他对历

史人物褒善贬恶的道德原则。这与封建正统伦理道德观颇难相容。一方面,司马迁对从皇帝到贪官酷吏的大小统治者秉笔直书,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他们自私、贪婪、残酷、卑鄙、奸诈、虚伪等不道德的行为,人道精神和民主意识是《史记》贬恶的基本标尺;另一方面,司马迁又对富于人道精神或道德高尚的人物作了热情的歌颂。在他的传记名篇中,蔺相如的勇敢机智以及“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李广的丰功伟迹、廉洁奉公和爱护士卒的仁爱品质,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对丑恶势力的抗争和高华伟洁的人格,都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外,司马迁还在《游侠列传》中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着意歌颂朱家、郭解等不符合封建统治者道德,着意歌颂对人忠诚、讲信用、能以自我牺牲精神“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在《田敬仲完世家传》和《司马相如列传》里,司马迁根本不以青年男女的“私通”为不道德,反而称赞他们在恋爱婚姻上不慕富贵、忠于感情的高尚品质。凡此种种,都与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相冲突,因此,班固曾指责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⑫,东汉末王允还攻击《史记》是一部“谤书”^⑬。然而,正因为《史记》对统治阶级虚伪道德的尖锐批判和对道德高尚者的深情赞颂,在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中是“史家之绝唱”,遂成为流芳百代的世界传记文学名著。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中所体现的道德原则,对后代传记文学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推许司马迁为“最其善鸣者”之一的韩愈,历来以明道、卫道者著称。他在《欧阳生哀辞题后》中说:“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他所谓的“古道”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内涵,此处不遑细论,而原始人道精神则显然是其中的核心组成因素。韩愈在众多优秀人物传记中对“凡为民去害兴利若嗜欲”者的歌颂,对杀身成仁、反对叛乱、为国捐躯者的赞美,对高风亮节、在污浊社会刚直不阿者的推许,对贫贱不移、在艰难困苦中保持人格尊严者的敬重,都从不同方面或不同角度体现出原始人道精神,是与司马迁奉行的道德原则遥相呼应的。自韩愈以后,优秀传记文学创作代有其人。除前面所举名篇外,再如苏轼的《方山子传》、黄宗羲的《柳进亭传》,侯方域的《李姬传》,其中都不难发现《史记》道德原则的折光。

我们知道,道德既是社会对人的某种规范和限制,也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肯定和个人的自我肯定,社会的道德观念与个体的道德追求,是在矛盾统一中发展变化的。高尚的道德原则是人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爱因斯坦谈人生》说:“人类最重要的努力莫过于在我们的行动中力求维护道德准则。我们的内心平衡甚至我们的生存本身都有赖于此。只有按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正因为如此,他还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在犯同谋罪”^⑭。这位现代西方科学伟人的道德观,与我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家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不无相通之处。以《史记》为代表的古代传记文学所体现的高尚道德形成了我国文化传统的可贵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继承发扬。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必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伴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走向没落,封建社会早期存留的原始人道精神和原始民主意识渐被摧残、压抑和阉割,“仁爱”、“民本”日益成为统治者高压专制的遮羞布,而“三纲五常”,君臣父子,愚忠愚孝等封建伦理道德则被大力倡导和宣扬,越来越成为束缚民众和文人的精神枷锁。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反动性、残酷性、腐朽性和灭绝人性,决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落后性、虚伪性、欺骗性和扼杀人性。正由于此,我国古代人物传记中充斥着大量封建伦理内容,表现出很强的封建道德色彩。一些优秀文学家创作的传记文学,也往往

难以摆脱此种局限。数千年宗法农业社会所滋生流变的封建伦理道德，成为人们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直至今日仍在意识或潜意识中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当代意识和科学眼光，运用批判继承的态度来对待古代传记文学，而不是凡古皆好，全盘继承，听任其中的封建伦理道德借尸还魂，影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求真精神和道德原则，决非是纯客观的思辩和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以情感为原动力并充盈于作品中的。马克思说：“热忱、激情是人类向他的对象拼命追求的本质力量”^⑮；列宁的名言为：如果没有“人类的情感，那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不能寻到人类的真理。人类的情感是寻求人类真理的强大动力”；梁启超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与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发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⑯。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流行的文艺“摹仿”说相异，我国的文学艺术历来强调“言志”抒情，具有鲜明的抒情性的民族文化特征。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的说法，“言志”即通常所谓陈述怀抱，包含着浓重的情感因素。明确提到诗歌抒情性的是屈原。《楚辞·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我国古代诗歌是以抒情诗占主流，传记文学的抒情性也显得异常突出。

把文学当成作者抒发自身情感志向的产物，这一观念首先是司马迁明确提出来的。他认为，自古以来的圣贤和志士仁人们之所以著书立说，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于是就通过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扬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寄希望于来者。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所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又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过与此几乎相同的话，并在最后加了这样几句：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所谓“发愤之所为作”或“舒其愤”，正是司马迁文化美学观的核心和实质所在，也正是他发愤著述《史记》的心理定势和情感导向。博闻广识又身遭酷刑的司马迁，充分认识和体验到个体与社会黑暗面的矛盾冲突，突出了文学所具有的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性，把文学当成个体独立地抒发情志的产物。因此，在他的传记文学中，包含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表现出尖锐的批判精神。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以极富抒情色彩的诗化语言描写屈原并加以评价，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深深叹息，对屈原的人品和才能高度赞扬，对《离骚》推崇备至，认为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对两位不过有一技之长的名医遭人陷害也深感愤慨。他在其赞语中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以匿迹自隐而当刑”，最后引述了老子的话说：“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愤郁之情溢于笔端。在司马迁的传记名篇如《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项羽本记》、《陈涉世家》中，他那“舒其愤”的情感导向则尤为强烈和鲜明地得到了

艺术体现。

与我国古代文论中倡导和流行的“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中庸观念相异，司马迁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中所表现的“舒其愤”的情感导向，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古代传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韩愈提出文章是“不得其平则鸣”的产物，是“郁于中而泄于外”的结果^①。他创作的传记文学，特别是那些情浓意挚的名篇，表现出感人至深的不平则鸣的情感导向。他为挚友柳宗元一人就写了三篇传记，从不同角度为柳作不平之鸣。作品借题发挥、激宕沉郁、悼叹无穷，不仅是赞美柳和抨击丑恶世俗，也是韩愈自身在历经坎坷和饱尝忧患后对社会和人生的洞察，是他“舒其愤”，“郁于中而泄于外”的表现。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在传记文学中同样表现出“舒其愤”的情感导向。其名篇《徐文长传》以“数奇”和“不得志于时”为主线，描写明代思想界的叛逆、文坛怪杰徐渭的生平，深情塑造出了一位狂放不羁、“抱愤而卒”的杰出的文艺家。为徐渭立传，重要原因是传主的奇才卓见和悲剧命运感动了作者，故凭借文章抒其积愤。

我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舒其愤”的情感导向，与传记作家在坎坷人生中历经忧患和对社会黑暗的深刻体察密切相关。著名文论家小泉八云在《文艺谭》中说：“伟大的作品，在过去或在将来，没有一种是一个不知道痛苦的人所写成的，一切伟大的文艺都是于悲哀这种沃壤中得到它的根源”。此论虽嫌武断，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颇耐人寻味。“国家不幸诗家幸，活到沧桑句便工”，艺术的真髓真正根源于人生的艰难历程。《史记》之所以被誉为“无韵之《离骚》”，成为可与荷马史诗比美的传记名著，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司马迁那“哭泣”和“舒其愤”的情感导向，包含着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感悟并且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相吻合，“舒其愤”成为他创作中的强大内驱力，促使他将自身的生命和热血倾注到塑造的形象中，故《史记》长成为耸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参天大树，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和不朽的文化审美价值。我国古代伟大或优秀的传记文学，可谓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创作动力和文化审美价值。

四

执著的求真精神、高尚的道德原则和舒其愤的情感导向，是我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的三大文化特征。应该看到，这三者既有相对独立性和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程度地表现，更突出的却是三者互为依托、交互作用、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其中，情感导向的重要性值得强调。传记中的求真精神是情感化的，道德原则同样是情感化的。只发挥自己个人哀愁的作品很难引发读者的共鸣，也很难具有文化审美价值。优秀传记舒其愤的情感导向，是作家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切入了民族和人类的总体历史进程，因此必然包含着真与善，符合民族和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的感情是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原动力，是滋生和体现高尚道德的不竭源泉。传记缺乏这样的情感导向，就很难有执著的求真精神，道德原则就可能只是令人昏睡的说教。另一方面，如果情感导向缺乏高尚道德的灯塔指引或未与求真精神相结合，传记则可能以丑为美，以假为真或真假难分，成为艺术劣品或等外品。

文学这一积淀了理性的感性中包含着最深邃的意蕴，体现着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文学感性形式下潜藏的抽象性决定了它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我国古代伟大或优秀的传记文学，总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生的艰难历程，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并以真情挚意唱出民族和人

（下转第45页）

有全面理解和运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评价路德和闵采尔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评述路德，大概是由于他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其阶级局限性，详而不漏，多有微词；而对路德的历史贡献，却是轻言寡语，甚或置而不提。评述闵采尔，大概是由于他是农民平民的代表和农民战争的领袖，则改用“扬其长避其短”的原则，为贤者讳。所谓“扬其长”，指的是赞扬闵采尔的革命精神，称道其思想理论的激进性；所谓“避其短”，指的是对闵采尔思想理论的空想性，讳莫如深，好像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种带有主观随意性的作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不相符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对路德和闵采尔作出合于客观实际的评价。

注释

①②③④⑦ 《马恩全集》第7卷，第407页，第406页。

⑤ 《马恩全集》第7卷，第409页。恩格斯在他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论及路德仇视农民的这篇文章时说：“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马恩全集》第1卷，第585页）

⑥ 《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9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马恩全集》第18卷，第655页，第653页，第654页。

⑮⑯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7、8页。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马恩全集》第7卷，第413页，第414页，第469页，第405页，第470页。



（上接第65页）

类的心声，因而能超越时空，流芳百代，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和宝贵的文化价值。

注释：

① 《西方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08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

③ ⑧⑨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史传》。

④ 刘知己：《史通》。

⑤⑪ 韩愈：《欧阳生哀辞题后》、《送孟东野序》。

⑥ 顾炎武：《日知录》。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2页。

⑩ 《庄子·天地》。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1页。

⑫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

⑬ 《后汉书·蔡邕传》引。

⑭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21页。

⑮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3页。

⑯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